



稳定的货币政策要合理适度

——读毛泽东等《边区的货币政策》

□ 刘明杰

1938年，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联名以电报的形式对边区的货币政策提出了6项原则。此封电报被收录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即《边区的货币政策》。其基本观点为，边区要有稳定的货币政策；边区纸币数量要适合市场需求；边区的纸币要有准备金；货币政策应以对外贸易政策为后盾；财政货币政策要着眼于军费；边区纸币币值应高于伪币。该电报虽然是向晋察冀边区负责人发出的，但实际上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抗战时期货币金融工作的一个整体的指导意见。

货币政策是对敌斗争的重要支撑

《边区的货币政策》开宗明义指出：“边区应有比较稳定的货币，以备同日寇作持久的斗争”，“边区军费浩大，财政货币政策应着眼于将来军费之来源”。实质上，抗日战争是中日两国以经济为基础的综合国力之间的较量，金融作为经济的血脉，在这场残酷的较量中对双方胜负起着重要的作用。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寇为了实现其经济掠夺目的，在占领区大肆发行伪币，严重破坏中国金融秩序。民族危难之际，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深入敌后，创建抗日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担负起领导全民族抗战的责任。此时，如果没有正确的货币政策，就不能粉碎敌人“以战养战”的经济阴谋；如果没有正确的货币政策，就无法广泛开展生产运动与经济建设，从财政经济上来巩固与扩大敌后抗日根据地；如果没有正确的货币政策，就无法保障正常的军费开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

据地必须有计划的与敌人发行伪币及破坏法币的政策作斗争，在被隔断的区域设立地方银行，发行地方纸币，严格检查和禁止私人操纵金融，扰乱经济，同日寇进行针锋相对地斗争，避免日寇“在金融上、财政上扼住了中国的咽喉”。

货币政策要建立在合理的基础之上

边区的纸币是“抗日的票子”，与日寇毫无价值的伪币和国民党通货膨胀的法币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种区别就体现在货币的币值上。如何实现货币币值稳定，毛泽东提出了以下原则：

一是“边区的纸币应该有准备金”。实行准备金制度是近现代货币发行的重要前提，也是保证货币币值稳定的重要措施。毛泽东提出了将“货物，特别是工业品”作为边区纸币的第一类准备金。因为战争年代，工业品是根据地军民所急需，人民群众所关心的不是边币能够换回多少金银，而是能够换回多少粮食和日用必需品。这实际上是由“物资本位”替代了传统意义上的“金银本位”。伪币是边币的第二类准备金，这是基于将伪币充当外汇手段的考虑。因为物资要在根据地内外流通，只有保持一定的外汇数量，才能确保边币币值不因商品入超或出超而大幅变动。法币是边币的第三类准备金。抗战初期，法币不仅在市场流通中占优势地位，而且因其与美元、英镑挂钩，币值相对稳定，因此，将法币作为第三类准备金对于保证边币币值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是“边区应该有适当的对外贸易政策，以作货币政策之后盾”。《边区的货币政策》指出，“边区工业品之来源是日寇占领地，边区农

业产品之出卖地，亦在日寇占领区域”。根据地对敌占区工业品依赖较大，同时，敌占区对根据地的农产品依赖更大。通过有针对性的双边贸易，根据地不仅能够打破封锁，换回必需品，而且能够实现货币流通与商品流通的汇流，使根据地金融市场呈现出生动活泼的景象。同时，通过与敌占区的双边贸易，能够获取工业品及外汇，充实边区纸币的准备金，保障边区纸币币值。

货币政策要控制在适度的范围之中

一是“边区的纸币数目，不应超过边区市场上的需要数量”。毛泽东首先从货币流通角度出发，要求按市场规律办事，即纸币数量要符合根据地市场流通的需要。如果发行数量超过流通需求，币值自然会下降；反之，如果发行数量不能满足流通需求，就会产生通货紧缩现象。同时，强调要对货币发行量进行动态调控，要考虑到受军事斗争影响，“边区之扩大和缩小之可能”，依据现实对流通中的纸币进行增发或回收。

二是“边区纸币应维持不低于伪币之比价”。《边区的货币政策》中提到了边币、法币、伪币、杂币4种货币，实际上指出了抗战期间存在着“两国四方”之间的货币斗争。四方斗争的最终走势是以边币的胜利而结束。首先，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终中国会赢得胜利，因此，伪币注定失败。其次，法币虽然在抗战初期占据优势地位，但通过对国民党军队在华北的军事失利，国民政府对日寇大量吸收法币只能被动应对的现实分析，毛泽东得出了“在抗战最后胜利之前，法币一定继续跌价，法币有逐渐在华北灭迹之可能”的大胆预测。杂币

是在军阀混战和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等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随着抗战走向胜利，其退出历史舞台是历史的必然。在指出“两国四方”货币斗争最终走势的情况下，毛泽东再次强调了边币要遵循市场流通规律，“如数量过多，亦会跌落”。同时，毛泽东指出货币斗争的中心问题是“边区纸币应维持不低于伪币之比价”，即一定要保持对敌货币斗争的优势，这种优势的基础在于实行适度的边区货币政策。

《边区的货币政策》中的基本观点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稳定的货币政策是对敌斗争的现实需求。要建立起稳定的货币政策就必须做好关键环节的工作，即货币政策必须建立在合理的基础之上和控制在必度的范围之中。合理的基础是保持币值稳定，这就要求必须灵活地运用准备金和开展对外贸易；适度的范围是控制好纸币发行数量，重点要保持对伪币比价的优势。只有建立起稳定的货币政策，才能在货币斗争中灵活应对、赢得主动，避免被敌方货币政策牵着鼻子走；才能有序地促进根据地经济建设，为军队提供稳定的物资供应，避免因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造成物资短缺。只有保障军费需求，才能源源不断地扩大抗日武装力量，确保根据地的不断巩固与发展，同时军事斗争的胜利也为货币斗争胜利奠定坚实基础。

《边区的货币政策》对抗战时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货币政策起到了很强的指导作用，其中蕴含的基本思想历久弥新，对于做好新时代货币金融工作亦有借鉴意义。



李光地（1642—1718年），清初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他勤于治学，学问渊博，除儒家经传以外，诸子百家都涉涉会通，得其要领。他倡导实学，并身体力行，曾声称：“吾学大纲有三：一曰存实心，二曰明实理，三曰行实事。”李光地在读书治学方面的独到见解，大都收录在《榕村语录》《榕村续语录》中，在今天看来仍具有启发意义和借鉴价值。

正心诚意，心无旁骛

李光地主张读书治学要存实心，即端正心意，保持诚实的内心，心无旁骛，不为物欲所蔽。他指出，读书不是为了追求名利，读圣贤之书的根本目的在于修养性情、完善人格，进而行道利世。

李光地强调：“读书以心为本，心不在，虽勤无益。”“佛家所谓‘如磨面驴，身虽行道，心道不行’是也。”“心为诸事之根”，只有心里通透一点，便为功甚大。李光地曾说：“只想弄钱，使身家宽绰，以图受用，将读书作第二义，使终身不得力。纪瞻（即何焯，字岐瞻，江苏长洲人，曾拜李光地为师）便不如此，他就是学几个字，看一首诗，也认真不苟且，要在这里安身立命，开花结子，便随便学问都有益。若是视此可有可无，以为消遣之具，终必无成。即早年有些才华，也终归于尽。”读书若为了“只是中举人、进士，如何荣耀，如何做官，如何归里，如何享受”，口虽在读书，而心未定，即便孜孜穷年，终将无益。读书治学不能作为满足口腹之欲的工具，也不能成为谋取功名利禄之工具。要做到修身利世，需心地纯正，保持心灵的宁静，超脱于物外，不为物所役。



存实心 明实理 行实事

——李光地的治学之道

□ 王晓兵

笃志不废，至诚不息

李光地主张为学必先立志，且要坚守志向，矢志不渝，不能半途放弃。要做到至诚不息，勤奋不怠，持之以恒。

古代学者大都主张为学须志向坚定。李光地强调笃志的重要性，“志立则神日生，要在提撕之力。”“非有一段毅然专致之诚，安能有得？”“国手于棋，亦终身之事。他刻刻不能离棋，可见一艺成名，也要至诚无息。”做学问亦如此。他认为：“资性有钝敏，不可强也。虽然，亦视其志之分数何如耳。如有十分志向，则其诚必不息。”古人有大成就者，往往是“惟有精进之力，无退悔之心；有广大之愿，无休歇之期”。人有资性不同，天资颖慧之人，也要有坚韧不拔之志，孜孜以求，积极有为，才能无微不入，无坚不破。拥有努力进取的毅力，没有退缩懊悔的心思；有远大的志向，永远不停滞不前，那么即便是愚笨鲁钝之人，也不足为忧，

终将会有所成就。否则，若没有坚韧之志，即使天资颖悟，一样难成大器。据李光地自述，他本人天资极钝，并非神童，然而能成理学大儒，就在于其志笃不废，孜孜不倦，一以贯之。

熟读精思，明其实理

李光地倡导读书治学要熟读精思，采其精英，应明白书中真实的道理，反对贪多不化。他在诗作《读书有感》中云：“泛滥同飘风，精熟乃根底。”读书不熟，终不得力；读书不透，多亦无益。他提出“精熟一部书之法”。

“精熟一部书之法”，精熟一部经典，以此为根本，就可以触类旁通悟透他书，先精熟再务博。李光地认为“学问须是熟”，信奉“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之法。他曾说：“某初读《参同契》，了无入处，用此法试之，熟后遂见得其中自有条理。初读《大司乐》亦然。用此法，又有入处，乃知此言果丹诀也。”魏伯阳所

谓“千周万遍”也。将一部经，一面细读，一面深思，用功到千遍，自然会心灵自悟，妙理自明，探其端倪，得其门户。

李光地主张读书治学“必以义理为先，开卷便求全体大用所在，至于义理融透淡洽，自然能记，即偶然忘记亦无害”。他称赞诸葛亮、杜甫、杨雄等读书能够抓住要领和根本，得其要义。“孔明当日独观大意，今人解作草略，便不是。大意者，即精英、根源也。杜工部读书难字过，便不屑记难字。如杨子云，乃是要采其精英。”李光地主张读书要学会分类编纂，撰写札记。他说：“将那一部书分类纂过，又随章札记，复全部串解，得其主意，便记得。某向看三角法，过而辄忘，后得其一钱穿下之根，便再不忘。”他还强调：“凡书目过口过，总不如手过。盖手动则心必随之，虽览诵二十遍，不如抄撮一次之功多也。”劝告后人在读书治学过程中，不能只停留在阅览和诵读上，要多动手抄写，同时要注重总结要领，研究书本的核心要义，这样才能得其要旨。

用典释义

天不言而四时行，地不语而百物生。

【讲话原文】

“天不言而四时行，地不语而百物生。”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唯一的家园。让我们继往开来、并肩前行，助力《巴黎协定》行稳致远，开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新征程！

——习近平《继往开来，开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新征程——在气候雄心峰会上的讲话》（2020年12月12日）

【出处】

白闻天不言而四时行，地不语而百物生。白人焉，非天地，安得不言而知乎？敢剖心析肝，论举身之事，便当谈笑，以明其心。而粗陈其大纲，一快愤懑，惟君侯察焉。

——（唐）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

【解读】

“天不言而四时行，地不语而百物生”出自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的首句，意思是说，苍天闭口不言，却使四季不断运行；大地默默不语，却让万物蓬勃生长。说明天地之间万事万物都有其发展规律，人们要顺应自然的客观规律，

按自然规律办事。这句话显然源自《论语·阳货》：“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上安州裴长史书》是考订李白生平 and 作品系年的重要资料，向来为李白研究者所重视。李白通过申述自己轻财好施、存交重义、养高忘机以及富有才情的种种品行，向时为安州长史的裴宽辩解自己遭受诽谤谗言、蒙受不白之冤的情况，同时希望裴长史能够重用自己。

2020年12月12日，习近平主席在气候雄心峰会上通过视频发表题为《继往开来，开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新征程》的重要讲话，阐释应对气候变化的中国主张，宣布中国国家自主贡献一系列新举措。他指出：当前，国际格局加速演变，新冠肺炎疫情触发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反思，全球气候治理的未来更受关注。并引用“天不言而四时行，地不语而百物生”，旨在强调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要遵循自然规律，人类要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对气候变化内在规律性的认识，努力适应和应对气候变化，在变化的气候中寻求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动态平衡。

（杨立新）

《行政管理改革》 2021年第1期目录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	【依法治国】
在新发展阶段不断开拓社会主义新境界 张西立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视域下中国特色监察官制度的构建 丁方旭 任进
“十四五”期间提升老龄人口医养服务路径的思考 杨燕绥 秦晨等	改革背景下立法的安定性问题研究 林珊珊
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若干建议 杨英杰 张启迪等	【应急管理】
【本期关注 社会救助法】	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修改研究 代海军
论我国社会救助法的基本原则 韩君玲	东京都防灾应急物资管理体系研究 万鹏飞 刘雪萌
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救助法的理论反思与实现路径 杨思斌 李德健	【乡村振兴】
	新发展阶段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障碍及突破方向 穆克瑞

脑，就都能在这个“源”的基础上融合成自己的东西。涵养学问还需要学会“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宽以居之”，李光地称赞“宽以居之”此句“大妙”。做学问需多闻多见，亲师取友，从容不迫，将所聚所辨之理皆汇聚于我，融会贯通，切勿强探力索，急于求成。如用火武将物煮熟，却要用文火煨，滋味才入。

务实笃行，经世致用

李光地主张读书治学要务实力行，要有治国安邦的真本领，要干实事，将所学化为技能，进而付诸实践，反对空谈心性。

李光地提倡经世致用的务实主张，强调要将书中的真谛与道理转化为做人做事的方式，知行合一，笃学力行。他指出“知”与“行”如同眼睛与脚的关系，缺一不可，“如目与足然，于今行路，眼看着路，脚才好走，一边看，一边走，两相须，两不相妨。岂有先看几北路，不干脚事；到走路，又不干脚事之理？”读书治学除了要加强个人道德修养，存实心、明实理外，更重要的是要落实到“行实事”上。他重视笃实的学风，主张要多干实事，反对空谈心性、不重实践的空疏学风，对于诸子百家，以及历数、兵法、水利等实用之学，莫不用心研究，深得要领，并用之以指导实践，干在实处。

